

归有光非唐宋派考论

何天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 习见的各类文学史及相关论著中均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 但历史上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不同说法。从归有光的交往、文学主张及创作风格等方面去考察, 很难得出归有光是唐宋派的结论。钱谦益过分夸大归有光与七子派的矛盾, 有意淡化归氏与唐宋派之间的本质差异, 此类误导应予澄清。

关键词: 归有光; 唐宋派; 七子; 钱谦益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2005)03-0068-06

在为数众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相关专著中, 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归有光划归唐宋派, 以致“归有光是唐宋派成员”成了“常识”。事实上近年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黄毅先生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上的《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 就是其中较有分量的一篇, 可惜的是应者寥寥, 没有在学界引起应有的重视, 足见“熟知非真知”现象的严重。归有光的流派归属问题, 毕竟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错综复杂的明代文学运动的问题, 因此有必要深入地澄清和剖析。

—

尽管明清文人不乏开宗立派意识, 但“唐宋派”之名, 却不见于明清典籍, “唐宋派”之得名, 乃近代治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者所定。我国最早的文学史是林传甲(或说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不过林著过简, 黄著主要是原文材料的堆积而论述甚少。相比之下,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虽出版于稍后的1918年, 但分量适中, 条理井然, 已有我们今天熟见的文学史的架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它第一次把归有光和嘉靖八才子置于同一节中介绍, 已包含两者间关系密切之深意。以后陆续出版的文学史中, 有两种值得注意, 因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倾向: 1935年出版的谭正璧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论明清文学以通俗文学为主, 显见受到西方近代文学观念重通俗文学的影响; 而1939年出版的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在明清文学段则以传统诗文为主, “是一部按照传统的文学概念来著作的《中国文学史》”^①。钱基博不仅将王慎中、茅坤、唐顺之、归有光置于同一节中, 还认为唐顺之“上接欧阳修, 下开归有光”, 其观点已较谢无量又进了一步。不过谢、钱的这一主张并未成为学界的共识, 只须看此后出版的两种批评史专著就不难发现这一点了。朱东

收稿日期: 2005-02-28

作者简介: 何天杰(1947-), 男, 浙江余姚人,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于1944年，第四十六节是唐顺之和茅坤，第四十七节是归有光及“弇州晚年定论”，显然没有过分强调归与王、唐之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于1947年，在“近古期”中有“唐宋派的文论”一节，专门介绍王、唐、归三人，书中提出“唐宋派”之名，而且明确把归有光算划归唐宋派。朱、郭二著是批评史专著，对文学史的影响是间接的，真正在归有光流派归属问题上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决定影响的，是稍后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从架构模式看，刘著先记述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再以时代为经，以文体、作家为纬，建构起文学史谱系。在社会学研究法成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后，刘著便成为解放后各种文学史的范式。在“唐宋派与归有光”一节中，刘大杰认为唐宋派主要成员是唐、王、归、茅诸人，而“在唐宋派中，创作成就较高，对于后人发生较大影响的是归有光”，这个结论被后来的各种文学史奉为圭臬。

上面我们对“唐宋派”名称如何提出、“唐宋派”成员如何逐渐被确定的过程，作了简单的梳理和回顾。然而在明清的有关文献中，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番景状。

现在所说的“唐宋派”是从“嘉靖八才子”脱胎而来^②，“嘉靖八才子”原本伏膺前七子，嘉靖十年后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转而推崇唐宋之文。嘉靖二十五年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集团形成，于是两大文人集团在文学观念上发生冲突。李攀龙《送王元美序》即云：“今之文章，如晋江、毗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闻？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奇怪的是，文中责难的是王、唐而不及归。从文意推算，李攀龙此文作于与王世贞相识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二年，而归有光直至嘉靖四十四年始中进士，可能这是李攀龙未把归放在眼中的一个因素，但作为一方盟主的李攀龙没有将王唐与归有光等量齐观，则是不争的事实。

归有光死于隆庆五年，其遗作由后人整理印行，但非足本，故传播不广，只在昆山附近流传^③。万历间登上政坛文坛的董其昌是松江华亭人，他不仅熟读归文，且深知唐宋派和七子间的纷争。董其昌对归的评价十分有趣：“前非李、何，后非晋江、毗陵，卓然自为一家之书”^④，认为归有光既反对七子派，又非议王、唐，是独立特行的文人。

清康熙时参与修《明史》者，多为由明入清、熟知明代历史掌故的耆旧。《明史·文苑传》引言谓：“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诗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该传中人物排列顺序基本按时间先后和流派，《文苑传三》王慎中以下是陈束、任瀚、熊过、李开先、茅坤等嘉靖八才子中人（唐顺之因属政坛人物，别有传）；以下是谢榛、李攀龙、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王世贞、胡应麟等后七子中人；最后才是归有光、胡有信。归有光与“嘉靖八才子”即当代文学史家所称的“唐宋派”之间，生生被插进了后七子们，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在《明史》作者的心目中，归有光并非唐宋派作家！

乾嘉时的汉学家王鸣盛是嘉定人，乾隆十九年榜眼，他曾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澹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⑤，其意见与董其昌有某些相似。由于王鸣盛是归有光的同乡，对归有光这位前辈乡贤的了解，来自学界宿儒的传授和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体悟，因此他的意见不容忽视。

照常理推测，与当事人的时代距离越近的人们，对事情本来形态就比后人更了解，也越有话语权。我们现在看到在归有光的流派归属问题上，前人和现代文学史家的判断竟如此大相径庭。事实究竟如何？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一个文学流派,无论是自称的还是后人追认的,总得符合下列几个条件:流派中人应该有相当密切的个人关系,能经常唱和切磋;他们提出过相类似的文学主张;他们的创作有相近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等等。若以这些标准来观察归有光与唐宋派作家的关系,就会发现归有光的同代人及清代一些学者的意见不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在《震川先生集》中没有一篇与唐宋派作家直接交往的诗文。而在唐宋派作家的集子中,除了茅坤有一首送归有光赴长兴任的诗外,王唐均无提及归有光的作品,假设他们属一流派,那是很不正常的。王慎中是福建晋江人,嘉靖五年进士,嘉靖二十年因得罪大学士夏言罢职,“家居”直至去世,与归有光素无往来还属情有可原,唐、茅二人与归有光关系之疏远就令人不解了。唐顺之是江苏武进(古称毗陵,今常州)人,嘉靖八年进士,他与归有光同为大儒魏校的弟子^⑥。唐顺之嘉靖十九年因上疏请求朝见太子,惹怒皇帝而被削职,在家乡读书十余年。此间归有光正在昆山读书应举,常州距昆山不过二百余里,两人却无来往。细绎之则事出有因:魏校卒于嘉靖二十二年,他病重后唐曾前去探望。但唐到魏家时魏校已去世三日,魏校后人把魏校遗稿托付给唐,唐转托苏州知府^⑦。归有光于嘉靖四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三年间有致友人的二信,信中提及与魏校的另一弟子周士淹一齐校定魏校遗稿之事^⑧,此时距魏校去世足已二十年,因此信中言辞不胜凄怆。也就是说,唐顺之实际上辜负了老师家人的嘱托,这大概就是唐、归虽然同出魏校之门却素不来往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再看茅坤,茅是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嘉靖三十三年被指控贪墨而罢职家居。嘉靖四十四年归有光中进士后任长兴县令,长兴是湖州府属县,两地相距不足百里,可他在长兴的三年中与家居的茅坤也是毫无来往!归有光与唐宋派成员的执意疏远,有其政治原因,与严嵩关系即其一。严嵩于嘉靖二十年即将入阁时刻印其《钤山堂诗集》,唐顺之为之作序,吹嘘严诗“雄深古雅,浑密天成,有商周郊庙之遗”^⑨,而茅坤的评价是“诗自屈宋以还,世唯霸臣骚客得之,故罕有历官宰执而以诗名者。公所赋,乃张曲江之流也”^⑩,可见唐、茅与严嵩关系不薄。严嵩在朝中与赵文华、胡宗宪等结党营私,而赵文华与唐顺之进士同年,唐顺之嘉靖三十三年复出就是赵文华举荐;胡宗宪则是茅坤的进士同年,胡宗宪任闽浙总督时曾聘落职的茅坤到军中参赞平倭。蓟辽总督王忬与严嵩关系素来不佳,其子王世贞又自恃文才常调侃严嵩之子严世藩,加上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因弹劾严嵩下狱,王世贞为杨求情,杨被杀王世贞等又哭祭于刑场并为之料理后事,严嵩更将对王世贞的痛恨转到王忬身上,怂恿党羽弹劾因战事失机渐失嘉靖皇帝宠信的王忬,将他置于死地。王忬灵柩运回故乡太仓安葬时,归有光应吴中士大夫之请,为他写了《思质王公谏》,称严嵩为“贼臣”,其纪念杨继盛的《祭杨忠愍公文》,则指责严嵩“父子持权,浚乱天下”。可见归对严嵩的态度与唐茅辈大异。再看归有光与七子派关系:归与何景明之孙何启图进士同年,两人又同号“震川”,归带着亲切之情写了《震川别号记》;在长兴时归与徐中行频频通信;隆庆二年,长兴豪绅乘归有光入京时飞流短长,归遂被调任顺德府通判,他连连上书要求退休,又是王世贞主动设法打听到朝中执政者是让他去做“书院山长”,归“方尔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复作行计”^⑪,赴顺德上任。这类事实都说明,归有光与七子派的情感上倒是比唐宋派更为贴近的,尤其是在晚年。

嘉靖八才子本是前七子的追随者,他们文学旨趣的转变,思想根源是阳明心学,这方面的论述颇多,本文不拟就此展开讨论。不过,要说清归有光与唐宋派成员的分歧,还得从思想本源上

入手。嘉靖朝是明代学风发生变革的时期,阳明心学开始风靡知识界。过去,在朝廷功令诱导压制下文人不得不遵从的程朱之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表面上似乎更合乎人之常心的心学渐渐成为一种时髦之学,而唐宋派成员学术思想的转向,就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实现的,李开先对此有相当生动的记载^②。唐顺之曾从学魏校,魏校入《明儒学案》的《崇仁学案》,此派大都坚持程朱之学,“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③。后来,唐顺之革职家居读书时与王门后劲如聂豹、罗洪先、季本等讨论心学,尤其与王畿关系密切,故有“于龙溪只少一拜”之说。归有光对唐的彻底转向是不以为然的,周士淹去世后归有光写过两篇悼念文字。《祭周孺亨文》云:“昔庄简公倡道于星溪,而一时学者之云集。曾日月之无几,而微言之顿息。唯先生发挥遗旨,俨师门之典则”,对周士淹坚持师说表示由衷钦佩;而《周孺亨墓志铭》云:“庄渠魏先生,于正德、嘉靖之间,以明道为己任。是时海内慕从者不少。后二十余年,能自名其师者,几于无人。孺亨笃信之如一日。……是时天下尤尊阳明,虽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后复向王氏学,唯孺亨称其师说,终不变。”更在周、唐二人对魏校之学前后不同态度的对比中,直接表示了对唐的不满。

归有光不以学术名世,但他较为侧重程朱之学,其思想可从他不同时期的几篇文章略见端倪。归有光34岁有《与潘子实书》,信中指出“今世之通患”是“学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听其言汪洋恣肆,而实无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这与他38岁时的《荀子叙录》所言“学者之于古人之书,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盖少也”,以及《孟子叙道统而不及周公颜子》中所谓“道统之传,自孟子之后,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而愈晦矣。章缝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颜孟,言之日是,行之日远。斯道之真,亡灭坏烂,几于不振,此则有志者之所深耻也”,都是对心学家末流不肯苦读领悟儒家经典,只会讲学的不满。归有光《忠恕违道不远》云“天下不求道于有,而求道于无。求道于无,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无也。求其无者,非求也”。对照一下王守仁与学生间的对答:“问于阳明子曰:道有可见乎?曰:有有而未尝有也。曰:然则无可见乎?曰:无无而未尝无也。曰:然则何以为见乎?曰:见而未尝见也”^④,便可知归的有无之说还不仅是对老庄学派有关主张的批评,更是对心学家以禅家语论道的不满。因此,归有光毫不掩饰对程朱的崇敬向往,他晚年作《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认定朱子“或时有过于离析附会者,然其大义,固不谬于圣人”,指责王门弟子“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由然”,反问他们:“果能有及于朱子万分之一否也?他还要王子敬到建宁的紫阳祠为自己进香,“俾先生有神,知数百载之后,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在“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几复无人”^⑤之时,归有光这一态度在士人群中可说是罕见的。

当然,说归有光与心学毫无关系,显见不是事实,而归有光和唐宋派的不同,正在于两者对心学的理解吸收的差异上。唐宋派文论的实质是“文道合一”论,这从唐顺之的“文章即性与天道也”、“文与道非二也”等主张中就可以看出^⑥。纯粹的道德理性主义使唐顺之等人看古人文章时对“首尾节奏天然之度”、“绳墨布置、奇正转折”特别关注,这暴露出他们对文学的外行;出于对“性与天道”的过分热衷,王唐将“头巾气”极重的邵雍、曾巩诗文视作珍品,这成为他们后来大都走上禅悦之路,进而彻底否定文学的直接诱因^⑦。与唐宋派对王学主要吸收的是去欲、灭情观念不同,归有光虽不反对心学“自得于心”的主张,但他没有对心学家们的“心外无物”、“无善无恶”说无条件赞同,没有像王、唐那样对身外世界渐取冷淡和疏离的态度。明代学术思想自成祖敕修《五经四书大全》至王守仁及其弟子辈的讲学,总体特点是庞杂空疏,或株守成说,或臆说作伪^⑧。归有光不仅“弱冠尽通六经、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⑨,而且旁及诸子、佛典,可

谓博览群书。在学习阅读中,归有光总结出—条规律:“道之在天下,易简而已”,正如佛典卷帙浩繁,“虽数万言,不过一二要言而已”^①。出于这种与众不同的以简驭繁思路,归有光把圣贤之理归纳成—句话:“圣人者,能尽乎天下之至情者也”,而“夫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也”^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提出“圣人能顺诸天下之理而已矣”,他认为“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圣人—明;因明而有好恶,好恶者,圣人—情;因情而有褒贬,褒贬者,圣人—言”^③。这两段话中将“情”与“理”打通,甚至视为—体。此外,在文、道关系上,归有光也讲“道”,但他不像王、唐那样以道否认文的独立地位,而是追求“文与道称”^④,主张文、道二者不容偏废。这类理论主张,都是归有光“情韵不匮”的散文所以高出唐宋派诸家—头的秘诀。当然,归有光集子中有不少陈腐平庸之作,真正实践了其“至情”、“文与道称”之文不多,可归有光正是凭着数十篇“情文”影响了后世散文创作的走向,奠定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这实在堪称奇迹。

三

归有光不是唐宋派的成员,他只是在某些文学主张上与唐宋派有相似之处而已,归有光的同时及稍晚—些的人们对此都有共识。而近代文学史家们却—个比—个更明确坚定地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否他们得到前人的某种暗示呢?我们只要看看晚明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了。

钱谦益万历中登上文坛政坛,天启中便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⑤颇值得注意,因为此文集中回顾其治学的转向过程:

仆年十六七时,已好陵猎为古文。空同、翁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为举子,偕李长蘅上公车,长蘅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语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临川汤若士寄语相商曰:“本朝勿漫视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学唐、宋古文。

文中的李长蘅即李流芳,“嘉定四先生”之一,万历三十四年他与钱谦益—齐到南京应乡试时向与钱有这番交谈。归有光曾卜居嘉定的安亭教学多年,“嘉定之老生宿儒,多出熙甫之门,故熙甫之流风遗论,叔达与程孟阳、娄子柔皆能传道之,以有闻于世”^⑥;汤显祖提醒钱谦益注意宋濂,并没有说明原因,而从下文“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为所淹没。万历中,临川能讼言之,而穷老不能大振”句意来推断,汤显祖同时还应向钱谦益推介了文学主张与宋濂—脉相承的归有光。钱谦益治学转向大约是在万历中晚期,受归有光的影响是转向的关键原因。因此,钱谦益后来才会应归昌世、归庄父子之邀搜集整理归有光文集。出于对七子派的不满和对归有光的偏爱,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归有光与王世贞之间的隔膜作了夸张,引出王、归间那场著名的“妄庸”之争。《列朝诗集小传》成于顺治六年,书中明代二千多位诗人的小传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钱谦益将嘉靖八才子、后七子置于丁集上,归有光和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竟陵钟惺、谭元春等人集中置于丁集中,这说明钱谦益此时对归有光与唐宋派关系的看法还较为谨慎。而钱谦益晚年的观点又进—步,他不仅在写于顺治十七年的《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中说“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正色”,夸大了归有光在明末的影响,而且在为宋琬所作的《读宋玉叔文集题辞》^⑦中归纳自己治学转向的四条原因,前三条讲受归有光和汤显祖的影响,第四条则称自己是从“毗陵初学《史》、《汉》为文,遇晋江王道思,痛言文章利病,始幡然改辙”中得到

启发,从而推崇唐宋的,言下之意已隐然将归有光与唐宋派视为一体了。

由于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领袖,其观点自不乏拥护附和者,其中有人就把钱谦益的观点进一步明确化。如吴伟业本是张溥的入室弟子,张溥在天启中组织应社,以通经复古为号召,因此吴伟业早年“为文大要根于六籍,佐以两《汉》,而尤长《春秋》”^②,但入清后吴伟业在钱谦益的影响下变成不折不扣的唐宋派,这从他写于顺治末年的《致孚社诸子书》中不难看出:“至古文辞,则规先秦者失之模拟,学六朝者失之轻靡,震川、毗陵扶衰起敝,崇尚八家,而鹿门分条晰委,开示后学。若集众长而掩前哲,其在虞山乎!”^③再如攻击七子派的健将艾南英也是钱谦益的追随者,他曾致书告友人:“足下又痛诋当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间,坏乱极矣。三君子当其时,……寂寞著书,傲然不屑,受其极口丑诋,不少易志,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④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归有光划归唐宋派,态度比钱谦益更为明确。

明末清初文坛对归有光与唐宋派关系的认识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看法。但钱谦益一派的主张后来渐渐沉埋于历史的尘埃中,只须举钱降清后虽曾任明史馆副总裁,而《明史·文苑传》却并未采用他的意见,就足以证明了。钱谦益一派中艾南英死于顺治三年,其文学成就也不能与钱、吴比肩,可忽而不论;钱、吴则先后主盟清初文坛,他们的意见迅速被人们遗忘,关键原因是他们均在乾隆年间被列入《清史列传·贰臣传》,就连他们的文集也屡遭禁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吴伟业《梅村家藏稿》,都是到清末宣统间才得以重新面世的。而此时恰逢文学史编写热潮兴起,钱、吴关于归有光流派归属的意见当然使文学史家倍感新鲜,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的嬗递承接不仅与西方科学观所强调的整齐划一若合符契,也满足了初次接触文学史的人易于记诵的要求;于是,归有光是唐宋派一员的主张,遂逐渐成为不刊之论。

从对归有光的误读中,对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两点启示。首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古籍文本的材料。古籍文本中既有史实性资料,又有评论性资料,评论性资料有其参考价值,但其中往往带有较强烈的个人情绪以及由此生发的偏见^⑤。因此一定要慎用,在使用时不仅应与史实性资料参见比较,而且不能只看一家之见,应在尽可能地全面掌握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评论意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其次,前人对某一文学现象的评论往往会因政治、文化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的变化而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取舍,从而造成评论性资料的或深隐或秀出。不宜忽略外在因素对文学的评论之干扰影响,否则就会不自觉地时代风气笼罩下作出错误的选择,在文学史上这是不乏先例的。正如近代文学史家对归有光的流派归属问题单方面地采用钱谦益的意见,这与乾隆后的史家毫不理会钱谦益的主张一样(钱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将归有光与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等排在一起,还是有其文学眼光的),都是不足为训的。

注 释:

① 周振甫:《中国文学史·后记》,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② 《李开先集·闲居集·吕江峰集序》,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③ 参阅归庄《归庄集·书先太仆全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 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凤凰山房稿序》,四库全书本。

⑤ 王鸣盛:《西泠居士集·钝翁类稿序》,道光自怡山房本。

(下转第 84 页)

诗文评有五类之多,但每一类的实际发展成果却是迥异的,“体兼说部”的诗话占据了极大的比例。与《文心雕龙》等体例严谨、系统性强的作品相比,诗话从文体上更为贴近史部。文体上的自由成就了诗话的包容性和随意性,但缺乏度的把握也造成了诗话的泛滥和极端化,诗话的文体形态正是缺乏统摄整体的主题的话语集合。小说就在这一点上与之接轨。

在此,我们寻得了诗文评中“体兼说部”者原先入选说部的线索:体例支离,内容不名一格是其一;所述间杂细碎的轶闻逸事乃其二,这便是诗话舞动的偏锋,也从这二者再次观照“小说”的面貌。诗话的文体形式虽削减了理性的锋芒,却颇有一种剑走偏锋的味道。偏锋成就了诗话的独特,也因这偏锋与小说“剪不断”的关系遭到了四库馆臣的贬低。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卷三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林利藩】

(上接第73页)

⑥ 见《明史·魏校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震川先生集·请敕命事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⑦ 《唐荆川文集·与王比涯苏州》,《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⑧⑩ 《震川先生集·与王子敬》,《震川先生集·与王昭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⑨ 《唐荆川文集·铃山堂诗集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⑩ 见张梦新《茅坤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⑫ 《李开先集·闲居集·遵岩王参政传·荆川唐都御史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⑬ 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⑭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七《见斋说》,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⑮ 《明史·儒林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⑯ 《唐荆川文集·巽峰林侯口义序·答廖东雪提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⑰ 参见王慎中《遵岩集·与李中溪书》:“明道之文,非徒辞章而已”(《四库全书》本);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寄王士南》:“日课一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谓反身,而又奚取于枝叶无用之词耶?”

⑱ 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积衰时代》,中华书

局1959年版;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四书五经大全》《书传会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⑰ 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⑱ 《震川先生集·答顾伯刚书·赠菩提寺坤上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⑳ 《震川先生集·泰伯至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㉑ 《震川先生集·圣人之心公天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㉒ 《震川先生集·雍里先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㉓⑳ 钱谦益:《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㉔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唐处士时升》,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

㉕ 《吴梅村全集》附录《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㉖ 《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㉗ 艾南英:《答陈人中论文书》,《临川文选》本《天佣子全集》卷五。

㉘ 可参见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林利藩】

that seven main cities in our country possess cer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but education and science are still generally lag behind, which will gi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soft environment; hard environment; higher education

A Strategic Study of Cluster Brand of Specialized—township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by ZHENG Hai—tao, ZHOU Hai—tao)

Abstract: The brand of industrial cluster has special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Br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s of specialized—township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luster brand of specialized—township economy,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brands' structural basis and stages of evolution, and has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part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brand strategy; region image

A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by FANG Zhong—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has become heated topic once agai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discussion of some views and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a basic way out to carry out key village planning, meanwhile,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western region can be developed along the road of key village planning—ordinary town—key town—city.

Key words: western exploitation; key village construction; breakthrough point

Discourse and Speaking for Others. Two Narrative Patterns in Du Fu's "Sanli" and "Sanbie" (by CHEN Jian—shen)

Abstract: In "Sanli" and "Sanbie", Du Fu narrates on the standpoint of a poet rather than of a historiographer. "Sanli" and "Sanbie" provided the ancient narrative poems with two narrative patterns—discourse and speaking for others—and vividly demonstrated the author's standpoint, attitude and feelings. To some extent, those happening event depicted in the poems were polished and fabricated. As a result, put in certain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between the poems and the history should centre on their coherent influence rather than on confirming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 narrative pattern; discourse; speaking for others

On Gui You—guang Not Belonging to the Tangsong School

(by HE Tian—jie)

Abstract: Gui You—guang was grouped as member of the Tangsong School in all kind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relevant treatises commonly found. Actually there were different statements about which school he belonged to. To examine from such aspects as his contacts with friends, his literary claim, and his style of writing, we are unlikely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he belonged to the Tangsong School. Qian Qian—yi exaggera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Gui and Houqizi excessively and intentionally gave a slight remark o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Gui and the Tangsong School. This misleading should be clarified.

Key words: Gui You—guang; the Tangsong School; Houqizi; Qian Qian—yi